

# 形态学视野中的现代章回小说

张 蕾

**内容提要** 从历史角度宏观把握现代章回小说的传承变化及其在整个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价值,是目前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形态学方法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章回小说走向了其生命的终结,但又孕育着新的生机。用形态学的“有机体”概念、“文化形态”理论、比较的方法及“挑战与迎战”的学说,可以清晰描画出现代章回小说的历史面影。

**关键词** 现代章回小说 形态学 斯宾格勒 汤因比 文化形态

张 蕾,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5123

章回小说作为中国传统小说最典型的创作体式,在晚清以后的发展变化可以纳入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总体研究框架中。小说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描画出了传统章回小说的面目。而晚清以后现代章回小说的一些具体作品虽已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被细致考察,但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小说,从历史角度宏观把握其传承变化及在整个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价值等问题却被忽略了。鉴于已有研究的缺憾,也鉴于章回小说历史发展演变的特点,本文采用形态学方法来研究章回小说的现代历程,以呈现现代章回小说的历史面貌与整体特征。

## 一、形态学方法及其对现代章回小说研究的适用性

从历史角度宏观考察现代章回小说,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但较诸社会历史批评、文体学研究等,形态学方法更为适宜。何谓“形态学”?这个概念最早用于生物学,是研究生命有机体的一门学问。把它运用于人文社会学科,把文化看成是生命有机体的研究者首推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斯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史观。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古典章回小说承继下的现代通俗小说形态研究”(13CZW070)的阶段性成果。

1889-1975)所著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继续深化了文化形态学理论。

文化形态学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有机体”的学说。斯宾格勒把文化发展的历史比拟为生命有机体的成长衰退历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生命周期。他在著作的开首处指出:“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生命历程,在习惯的思维和表达中,通过冠以诸如‘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这些高级实体之名,而被赋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征。对于一切有机的东西来说,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sup>[1]</sup>每一种文化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都要经历生长衰亡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为历史。斯宾格勒分出了八种文化,所谓“西方的没落”是指西方文化已进入了完成与终结的时期,斯宾格勒用“文明”一词来指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汤因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把“文明”分为二十一种,从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来构筑历史。其次是对文化“形态”的解释。“可见的历史是心灵的表现、符号和体现。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sup>[2]</sup>文化形态学即是对文化所有的表现形式及其结合为文化整体的“心灵”的研究。以往历史学家把历史看成是具有时间因果联系的科学,而斯宾格勒把历史看成是“文化形态”。由心灵和表现形式构成的形态研究才是二十世纪史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再次是比较形态学的方法。从地球生命的时间长度来看,人类文化的存在时间还十分短暂,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共时性的,可以对它们作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打破了以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因为每种文化都要经历生长衰退的过程,所以每种文化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构成对称关系。汤因比认为:“一部成书于2300多年前另一个世界的著作封存了种种体验,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自己这一代人才刚刚开始这些体验。公元1914年与公元前431年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sup>[3]</sup>因此比较形态学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透析所研究文化的历史位置。

文化形态学对西方和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几乎是同时的。二十年代王光祈、张君勱等学者就开始介绍这一思想。1930年叶法无出版《文化与文明》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从进化论视角对之作出了批判。1942年由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一书出版,书中收录的两篇长文均为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勃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所作的演讲报告,阐述了西方学者对文化形态学的研究和看法。文化形态学在中国最有力的呼应者是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林同济和雷海宗。他们在《战国策》等刊物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中外的春秋时代》等文,运用文化形态学来划分中国历史。文化形态学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也启发了文学艺术领域的相关研究。例如卡冈(M.C.Каган, 1921-)《艺术形态学》、柯汉琳《美的形态学》、葛红兵《文学史形态学》、盛子潮《小说形态学》等,均意识到形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对文艺研究的价值。盛子潮明确指出把形态学引入小说研究的三点意义:“研究小说本体的认识意义”、“打通小说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建立一种新的小说发展史观”<sup>[4]</sup>。鉴于此,把形态学方法运用于现代章回小说研究,同样可以开启新的视景,让小说找到其适当的历史位置。

如果把文化形态学的基本观念对照于现代章回小说,会发现两者的契合性。参考“有机体”的观念,章回小说也有其生长、兴盛和衰落的生命历程。石麟等学者已对章回小说各创作阶段作出了历史分期。石麟把古代章回小说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章回小说的勃起阶段。时间大致

[1][2][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第5页。

[3][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7-938页。

[4]盛子潮:《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6页。

在元末明初”；第二阶段是“章回小说的凝滞阶段。时间大致在明前期到明中叶”；第三阶段是“章回小说的再兴阶段。时间在明代后期”；第四阶段是“章回小说的鼎盛阶段。时间在明末清初”；第五阶段是“章回小说的衰微阶段。时间在清中叶”；第六阶段是“章回小说的新变阶段。时间在晚清”<sup>[1]</sup>。对此划分论者意见不尽相同,但都把《儒林外史》、《红楼梦》时期的章回小说看作是章回小说发展史上最辉煌的阶段,而晚清,则成了章回小说的“新变”期。

晚清以后章回小说的发展情形,已有研究论及甚少。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鲁迅等新文学家的小说创作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张恨水等章回小说家的作品依然主导着市民读者的闲暇领域。在此局面之下,中国章回小说走上了现代化的新历程。在这一新历程中,章回小说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汤因比把一种文明的成长看成是“挑战与迎战”的结果。他说:“子文明一方面必然要面对它们继承的先驱文明解体时的人为挑战,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情况下同独立文明一样,要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sup>[2]</sup>只有成功战胜各种挑战,文明才能开启它的生命历程。“新”与“旧”的对立、西洋文学的冲击、现代传媒的兴起、日常生活境遇的改变、作家思想的变迁……所有这些都“挑战”着章回小说的生存,它必须“迎战”才可能立足。汤因比认为,挑战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迎战才能获胜。如果超出一定限度,迎战就不会成功,文明便被扼杀。文明是在不断的“挑战与迎战”的过程中得到成长。章回小说面对的现代挑战力量强大,其迎战显得艰辛困苦。新文学小说对章回小说的吸纳,以至解放区出现“新章回小说”,证明章回小说的迎战获得了一定成功。而章回小说变革传统体式,乃至向新文学小说靠拢,则又说明迎战的失败。总之,在这次卓绝的“挑战与迎战”中,中国章回小说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或者说最终汇入了现代小说的历史进程中。

## 二、现代章回小说的生命形态

中国章回小说被西方小说重塑,最好的例子是鲁迅的《阿Q正传》。比起鲁迅的其他小说,《阿Q正传》更为家喻户晓,不仅是因为小说国民性批判的深刻思想主题,更是因为鲁迅叙述小说故事的方法。汪晖说:“《阿Q正传》的叙述方法与通常的‘五四’小说很不同,不像典型的现代小说的写法”,它“采用了说书人的叙述方式的某些要素”<sup>[3]</sup>。“说书人的叙述方式”属于章回小说的叙事传统。小说第一章中的“我”和章回小说中说书人的职能相似,都介绍主人公的出生来历,然后无所不知地叙述主人公的言行心理,直到阿Q死亡才结束故事。阿Q的故事被叙述得头尾完整,明白有趣,具有章回小说的通俗化特征,和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相适应,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流播深远。三四十年代,在新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中,巴人谈《阿Q正传》道:“《阿Q正传》中那种以作者露脸说话的手法,是和旧小说里的体裁有很大的因缘的。这一手法运用得好,颇能尽艺术的概括的功用。这固然也是讽刺文学的特质,但在《阿Q正传》里,我们确实看到了所谓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特征,《阿Q正传》成为中国读书界最普遍的读物,决非无因的。”<sup>[4]</sup>

《阿Q正传》不仅是章回小说和西方小说相融的产物,它的刊发形态也和其他现代章回小说相似。鲁迅说:“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sup>[5]</sup>《阿Q正传》是边写边刊的,每

[1]石麟:《章回小说通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2][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3]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上海〕《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

[5]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一章故事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时刊发小说的编辑孙伏园希望鲁迅能多写几章,鲁迅最终只写出九章,便收了尾。这种可长可短的结构也是晚清以来章回小说创作的重要形态。晚清以来的章回小说创作与现代报刊关联密切。像《阿Q正传》那样,被编辑催稿、边写边刊的现象对于章回小说家是常事。毕倚虹写《人间地狱》即如此:“去年来海上,事物较杂,每届黄昏犹未著一字,赖周瘦鹃先生频以电促,使余不能偷懒。是《人狱》之成,瘦鹃实第一功臣。”<sup>[1]</sup>报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小说面世的方式,章回小说必须适应报刊连载的生存环境。对于卖文为生的小说家来说,这很容易导致小说质量不保。“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藪,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不知凡几。”<sup>[2]</sup>质量下降,章回小说前景也就岌岌可危。同时报刊连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章回小说传统体例的消解,“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起即是章回小说现代蜕变的一种表征,是章回小说适应新环境的产物。从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到二十年代《人间地狱》再到四十年代《八十一梦》等等,因为连载需要,创作就失去了筹划酝酿的平和状态,只得信手拈来编辑故事了。一部小说叙述多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小说因此能根据不同需要可长可短。章回小说发展至此,构架基本被拆解。鲁迅以“杂集‘话柄’”<sup>[3]</sup>来论晚清的这类小说,他对这种写法了然于心,于是顺笔拈来,用同样方法写出了《阿Q正传》。

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新文学正是章回小说面临的新的生存境遇。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晚清以后的章回小说进入了“文明”阶段,或者用汤因比的概念,进入了“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阶段。汤因比说:“文明衰落指的是未能勇敢地超越原始人类的水平进而达到现在超人的水平上。”<sup>[4]</sup>章回小说的文体模式基本被《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写定,现代章回小说作者,即便如张恨水,也难以再对这种文体塑形有多大贡献,于是只能走上变革之路。而变革即意味着“解体”的开始。1940年代,徐文滢对此论道:“章回小说由盛而衰,由衰而没落,正如一切文艺风派的各有其末运一样,是文学史上永远的一个公式:‘新陈代谢’。”<sup>[5]</sup>民初,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自今而往,章回小说不易有佳作。”<sup>[6]</sup>《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是费尽心血之作,而现代章回小说的作者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闲情。他们被现代报刊出版业的运作机制所牵制,也为城市生活所累,所成作品难免带有“迫不及待”的痕迹。但“衰落”,只是有机体生命的一个阶段,并非全呈败象。徐文滢就此说道:“现在章回小说的潜势力不但仍然广大的存在着,它握有的读者群且确是真正的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能把它的势力估得太低。《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的广销远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而且恕我说实话,若以近代小说的评衡标准来估价,民国以来实在不乏水准以上的章回作品。”<sup>[7]</sup>这是现代章回小说的价值所在。

### 三、现代章回小说的整体特征

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开启了它生命的进程。到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等小说出世,章回小说臻

[1] 娑婆生:《赘言》,《人间地狱》(第一集),[上海]自由杂志社1924年版,第1页。

[2] 寅半生:《〈小说闲评〉叙》,[上海]《游戏世界》1906年第1期。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5] [7] 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上海]《万象》第1年第6期,1941年12月。

[6] 解弢:《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版,第115-116页。

于全盛。至清末,章回小说已存在了五百多年,不免显出老态。晚清民国的章回小说作家一方面承袭传统章回小说的创作方式,继续延伸章回小说的艺术生命;另一方面努力探索改良途径,从内容到形式,希望章回小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晚清新小说从观念内容方面提升了章回小说的地位和品质,民初文言小说,如《玉梨魂》等,最大程度地实践了章回小说语言雅化的可能性。二三十年代张恨水、向恺然等小说家推出了他们的力作,《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等作品,既让章回小说发出了最后的辉煌,同时也拓展了章回小说的改良之路。四十年代的章回小说与新文学小说显示出亲和关系,传统章回体式的消解和革命故事的叙述,意味着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可以说,晚清民国年间章回小说创作的种种表现最终令章回小说生命周期的任务得以成功归结。

由于现代章回小说处在衰落期的历史位置,它与传统章回小说相比,显示出了诸种不同面貌。首先在章回体制方面,回目制的逐渐消失是现代章回小说的首要特征。回目は章回小说的标识。张恨水在写《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时候,特别注重回目的藻丽工整。他为自己规定出做回目的五条原则,“往往两个回目,费去我一、二小时的工夫,还安置不妥当”<sup>[1]</sup>。如此苦工,对于现代章回小说来说,逐渐显得没有意义。古典章回小说藻丽工整的回目除了能概括本章大意外,也是作者展露辞章才华的有效途径,并且在以文言为书面语体的时代,文章标题自应用诗文来表述。但当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之后,藻丽的回目便显得不合时宜。而报刊连载小说,章节标题的工整与否并不影响小说的阅读接受。张恨水逐渐体会到这些,终于放弃了原先做法。写于1931年的《太平花》就被他修改了好几次。1933年写完的时候是三十六回,出版时改成三十回,1945年百新书局再版时又改成二十六章,不再编织回目而采用字数不等的白话短语来提示每章内容。张恨水说:“《太平花》这部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写作,但在这两度大修改之下,也就可以看到‘白云苍狗’,人事是变幻得太厉害了。”<sup>[2]</sup>这里的“人事”不仅指历史社会的变迁,也包涵着章回小说观念及做法的变革。现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最终放弃了回目制。郑逸梅在《章回小说之回目》中列数了晚清以来章回小说回目的各种变化样式<sup>[3]</sup>。至四十年代秦瘦鸥《秋海棠》等小说,篇章标记与传统回目有很大不同,倒和《阿Q正传》的体制十分相似。如果说《阿Q正传》借鉴了章回小说的写法,那么现代章回小说则借鉴了新文学小说和西洋小说的写法,走到了其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同时孕育着新的生机。

体制上的新变和小说故事的焕然一新紧密相连。晚清“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提倡“新小说”即希望更新传统章回小说的面目。在《新小说》第一号上梁启超开始连载他的章回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作品被列在“政治小说”名目下,充分表明梁启超对新小说寄予了政治理想。他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sup>[4]</sup>“寻常说部”在梁启超看来“不出海盗海淫两端”<sup>[5]</sup>,而《新中国未来记》寄托与传达了政治观念,小说的通俗特征成了传达观念的工具。这样小说就取代了传统诗文“文以载道”的地位。现代章回小说虽仍不脱娱乐大众的天性,但小说家在创作时都会考虑到“载道”的任务。孙玉声写作《海上繁华梦》道:“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sup>[6]</sup>小说不再是传统士人的游戏笔墨,而是面对市民读者的公众消费品。张恨水对此就认识得十分深切:“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

[1][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第55页。

[3]郑逸梅:《章回小说之回目》,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日本横滨〕《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5]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日本横滨〕《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

[6]孙玉声:《自序》,《海上繁华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sup>[1]</sup>传统章回小说养成了市民读者的阅读嗜好,张恨水要通过“写现代事物”来影响他们的思想,担负起小说家的责任。所以有学者会说:小说“犹如一面历史的镜子,读者通过这些小说,不但可以欣赏到那个时代里的许多离奇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还可以学到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民俗史中学不到的关于那个时代里的经过形象化与生活化了的许多感性知识”<sup>[2]</sup>。由于故事的现代化与现实感,现代章回小说折射出了社会历史的生动面影。

故事创新更显著的表现于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的“新章回小说”。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展开使章回小说找到了新路向。小说的受众不再仅仅是市民而及于乡民。章回小说要为农村和农民写作,这对于生长城市的章回小说而言是全新的课题。1944年7月柯蓝创作的《洋铁桶的故事》发表于延安《边区群众报》,这是解放区的第一部新章回小说。此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红旗呼啦啦飘》、《地覆天翻记》等章回小说先后问世,开辟出了农村故事的叙述空间。茅盾谈解放区章回小说道:“旧的改造,新的增加,有多有少,各篇不同”。“然而这几部长篇都为解放区读者所喜爱。这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实验’,这启示我们:运用旧形式的尺度,它的伸缩性可以很大。”<sup>[3]</sup>但是,当章回小说进入农村,和政治革命相遇合,也就脱离了城市母胎的自在空间而显得落寞。解放区的章回小说最终在“十七年”文学的革命英雄传奇中得到衍生。

由解放区文学奠定的农村权力话语构成后来文学创作的主旨。1949年9月5日,文艺报社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总结过去章回小说创作的得失。因所基于的观念话语,会议对现代章回小说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基本掩盖了已取得的成绩<sup>[4]</sup>。章回小说创作随即休止。

撇开历史偏见,就形态学眼光看,可以对现代章回小说的特征作出如下总结:第一,现代章回小说是章回小说生命发展史的最后阶段,表现出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的形态。第二,由于生成环境的变化,章回小说在体式方面发生诸多变革,其中最显见的是小说回目的消失。回目变成章题,章回小说名实不符,创作生命也就渐趋消歇。第三,小说家写作章回小说不仅是为了娱乐或者谋生,也有一份担当与责任。当小说叙事从城市转向农村时,这种担当与责任便和时代政治紧密相连,于是产生于市井文化的小说便背离了它的初衷,它的转向也意味着新的生命形态的开启。第四,现代章回小说和其他现代小说——主要是新文学小说,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取鉴。处于“挑战与迎战”状态下的章回小说不得不寻求改变的生存之道。变则通,章回小说最终汇入现代小说的历史进程中。

〔责任编辑:平 啸〕

[1] 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

[2] 魏绍昌:《编余赘言》,严独鹤《人海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3] 茅盾:《再谈“方言文学”》,〔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

[4] 《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北京〕《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